

● 中国历史

汉字文化对日本的深广影响

冯 天 瑜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冯天瑜(1942-),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及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

[摘 要] 作为汉字文化圈成员的日本,深受源于中国的汉字文化的影响,自汉字、汉籍传日之后,汉文和汉字词广为使用,其国名(倭、日本)是汉字文化的产物,其伦常、政治的核心概念“天皇”来自汉字文化,“年号”、“谥号”及一系列皇室用词和许多关键词,均脱胎于汉字文化。

[关键词] 汉字文化;日本;天皇;年号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4-0389-07

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说:

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卤水^[1](第7页)。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日本文明是中国文明的“交流文明”、“卫星文明”。

这些论说生动表述了日本文明对中国文明的依存关系,而这种依存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由汉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组成的“汉字文化”的影响力造成的。

(一) 汉字传日·“神代文字”子虚乌有

在传入汉字之前,日本没有文字。《隋书·倭国传》称,古日本“无文字,以刻木结绳记事。”日本学者斋部广成作于9世纪初的《古语拾遗》的序文说:

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2](第9页)。

日文非“自源文字”而是“外源文字”,此为不刊之论。但日本中世至近现代,不断有人否认这一历史真实。镰仓时代中期的神官卜部兼方在《〈日本书纪〉的解说书》中,首先提出“神代文字”说,室町时代的复古主义者沿袭此说,江户时代国学者平田笃胤于文政二年(1819)撰《神字日文传》,重提此说,并具体陈列若干“神代文字”,20世纪上半叶的军国主义分子更大肆鼓噪,称在本为虚拟的神武天皇(据传在公元前660年即位)以前的“神代”,日本已经自创文字。然而,稍加比勘就可发现,平田笃胤们展示的所谓“神代文字”,不过是对15世纪中叶朝鲜颁行的谚文的模仿,显然是近世日本人生造的赝品,决非2600年以前的原作。正直的日本学界人士早已力辟关于“神代文字”的妄言,恢复日本受容汉字文化的历史本来面目^①。

汉字入日约有2000年历史。在日本发现的来自大陆的较早汉字,是新莽时期(公元前45年—公元后23年)铸字币上的“货泉”。汉字传日最著名的实证是:日本天明四年(1784),筑前国(今福岡县)志贺岛农民甚兵卫挖水沟时掘得一方蛇纽金印,文曰“汉委奴国王”(“委”为“倭”的通假字),与《后汉书·东夷传》记载的“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相合。这些材料证明,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末、公元后一世纪的东汉初,随着载字实物(铜币、金印等)的进入,汉字已传至日本。

(二) 汉籍东传·王仁入日时段考

日本关于汉字传日的正式说法,是与汉籍传日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第一部书面文献——太安万侶712年撰写的《古事记》说,应神天皇时期,百济国照古王派和迺吉师来日本,向天皇贡牡马、牝马各一匹和横刀、大镜,以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成书于720年的勅撰《日本书纪》(舍人亲王等奉天皇之命,用汉文撰写的编年体史书)所述稍详:百济王遣阿直岐前往日本朝贡,献良马二匹,天皇还赐后,要阿直岐推举讲授经典的人,阿直岐力荐王仁。下面的情节是:

(应神天皇)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故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

《古事记》提到的和迺吉师即《日本书纪》所称的王仁,当是侨居百济的汉人或汉人后裔,具有较高的汉字文化素养。他携去的《论语》,据考证是郑玄注十卷本;《千字文》当然不会是晚于王仁的梁朝周兴嗣所撰本,而是晋朝流行本。王仁将汉字文化传授日本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故被《古事记》尊为“文首等祖”,被《日本书纪》尊为“书首等之始祖”。经王仁传授的菟道稚郎子成为皇室贵胄中最先熟知汉文的人物。正因为如此,应神天皇二十八年,高丽王使者赴日,所上表文有“高丽王教日本国”等语,菟道稚郎子阅毕而怒斥表文无礼。这显示了日本此时已能与高丽用汉字文化相辩难。继王仁之后,百济的五经博士纷纷赴日,《日本书纪》提及的有段杨尔(公元513年赴日)、高安茂(公元516年赴日)、王柳贵(公元554年赴日)等,随王柳贵同往日本的还有易博士、历博士、医博士等专科学者。

王仁赴日(亦即汉籍入日)究竟在哪一时段?日本史上排列有序的天皇纪年,始于继统天皇元年(507),应神天皇在此之前,故属传说时代,一般推测在4、5世纪之交,即中国的东晋末年、南北朝初年;若按日本史学家那珂通世提出的纪年法推算,应神天皇16年,当为公元447年,即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当时百济是日本的纳贡国,《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载与之吻合。正是依据这两部日本最古老的书面文献的记载,人们把4、5世纪之交(东晋末年)或5世纪中叶(南北朝时期)视作汉字文化正式进入日本的起始。若参之以日本博多湾沿海及大和盆地出土的3世纪(邪马台国时期)的金石文字和5世纪铁器、铜器上的铭文,如《船山古坟太刀铭》、《隅田八幡宫人物画像镜铭》,那么汉字、汉籍的入日,当在3世纪前后。至5世纪,即日本大和时代的古坟时期,日本已有人较熟练地掌握汉字,写作汉文。

(三) 汉文及汉字词广泛使用

由于日本语与汉语大相径庭(汉语是孤立语,日语是粘着语;汉语属汉藏语系,日语系属不详),日本人学习本为记述汉语的汉字当然困难,故汉字文化输入日本,开始主要由赴日的汉人、韩人(日本称其为“归化人”)掌握。当时日本的官方文件、文化典籍全系汉文,多出自汉人、韩人手笔。中国正史《宋书》卷九十七《蛮夷列传》载倭王武(据考为日本史书所称“雄略天皇”)于宋顺帝升明二年(478)所上表文,是现存日本最古的汉文,日本学者考证是“归化人”身狭青与桧隈博德所撰(“身狭”“桧隈”是这两位入籍汉人所住大和高市郡的地名,他们依例以地名为姓氏),其文骈俪,措词颇得六朝神韵,试看开头一段:

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祚,躬环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宁处。

表文可能经修纂《宋书》的沈约等人润饰,但仍显示了5世纪下半叶日本的汉文学水平,其间使用大量汉字词,如封国、作藩、王道、天极、义声、忠节等等,大量借词于汉字文化。

随着汉字文化在日本社会上传播,皇室、贵胄、官员逐渐掌握汉字、汉文。592年,日本推古女皇即位,翌年以侄儿厩户摄政(谥号圣德太子,593—622年间执政)。圣德太子是汉字文化热烈的学习者和推行者。《日本书纪·推古纪》记其青年时代说:

且习内教于高丽僧惠慈,举外典于博士觉智,悉兼达矣。

“内教”指汉译佛典,“外典”指儒家经典,均属汉字文化。太子摄政后,于603年订《冠位十二阶》,按德、仁、礼、信、义、智各大小二阶排列贵族为12阶,而上述6个单字词,皆为儒家的重要政治、伦理概念。翌年太子亲撰《宪法十七条》,其思想及文词皆出自中国经典(包括汉译佛典),如“以和为贵”、“上和下睦”、“笃敬三宝”、“承诏必谨”、“以礼为本”、“惩恶劝善”、“信是义本”、“明察功过”、“赏罚必当”、

“背私向公”、“使民以时”、“不可独断”等等,或直取经文,或稍加编组,全然学自汉字文化。如第三条(句首“承诏必谨”)论君臣关系,文曰:

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

“君天臣地”典出《管子·明法解》:“君臣相与高下之处也,如天之与地也。”“天覆地载”典出《中庸·第三十一章》:“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此类用例,通篇皆是。

圣德太子之后,日本历代诏敕均用汉文,文词多采中国古典,如仁德天皇的诏书有“君以民为本”之语,典出《荀子》;圣武天皇天平十九年(747)下诏自责,语称“此盖朕政教民于不德”,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八年(764)诏曰:“天津日嗣之御位,天所授赐”,皆典出中国经书,从思想到句式与中国帝王诏敕别无二致。至平安时代(794—1192),日本士人接受汉字文化教育,多能阅读汉文典册,撰写汉诗、汉文,公私函牒也通行汉文。日本第一部官修史书《日本书纪》(720)及几种续编仿《史记》《汉书》体裁,并且皆用汉文,其中有些文章甚至套用汉文,如《日本书纪》卷首记宇宙开辟:

在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浑沌如鸡子,溟滓而含牙。及其清阳者薄靡为天,重浊者淹滞而为地。

几乎照抄《淮南子·天文训》。《日本书纪》载雄略天皇遗诏,则是《隋书》所载隋文帝遗诏的仿制品。先看“雄略遗诏”的一段:

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朝野衣冠,未得鲜丽,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

再看《隋书·高祖纪》载仁寿四年隋文帝遗诏的相应段落:

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

显然,《日本书纪》是参照《隋书》撰写的,从体例、思想到文辞,都刻意模仿。也正是在这亦步亦趋的效法过程中,以汉字词语为载体的汉字文化,全方位楔入日本文化。

日本最早的诗歌集《怀风藻》(751)、文集《本朝文粹》也全为汉文,随后的诗文集,如《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均为汉文。以《怀风藻·序文》为例,俨然六朝四六骈体,并熟用汉字词。试看其中段落:

王仁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敷教于译田,遂便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逮乎圣德太子,设爵分官,肇制礼义,然而专崇释教,未遑篇章。

《怀风藻》收录的弘文天皇《侍宴》,短短的五言诗,使用一连串汉字词:

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

平城时代及平安时代初期是日本仿唐文化的极盛期,10余次遣唐使将唐朝诗文带回日本,善写汉诗成为当年日本士人的时尚。在唐朝生活36年的阿倍仲麻吕(唐名晁衡)的律诗造诣甚深,他回国时用日文咏和歌一首,送行者不懂,阿倍当即用汉文吟出: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刻诗)

其意境、文词,置之璀璨的唐诗行列中也并不逊色。

镰仓时代(1192—1333)“和汉混淆文”逐渐流行,室町时代(1336—1573)和江户时代(1600—1867),贵族社会解体,武士和市民兴起,对汉籍的“训读”“训译”日趋普遍,但日语中的汉字词仍占优势,汉文学也一直是日本文学的一支劲旅。江户时代修纂、明治末(1906)完稿的《大日本史》,从史观、体例到文句,都仿自中国史书。试看其中《楠正成论赞》的一段,与中国正史论赞如出一辙:

此其忠义之心,穷天地亘万古而不可灭。身虽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正行受遗托,能建义旗,始终一节,以死报国,可谓忠孝两全矣。

赖山阳所著《日本外史》更酷似中国史书,此书传入清朝,一些中国学者误以为出自中国史家手笔。

以《日本外史》卷五中《楠氏论》的一段为例,即可见一斑:

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节巍然与山河竝存,足以维持世道人心于万古之下。比之奸雄迭起,仅传数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明治维新后,日本文体有欧化倾向,但皇家重要文献仍用汉文,如1889年颁布的《帝国宪法》便纯为汉字文言。汉学家的汉文则不让中国文士,如竹添光鸿的中国游记《栈云峡雨日记》即为优雅的汉字文言文,试看其中《长安今昔》里的一段:

辰牌抵灞桥,古昔长安送行者,至此折柳为别,今犹存老柳数株,其续栽者亦葱葱可爱。河底皆白沙,水行其上,如鸣环佩。古人云:诗思在灞桥驴背,盖不诬也。

文中“灞桥折柳”典故信手拈来;“诗思在灞桥驴背”一语也采用得体,该句出自《全唐诗话》中郑繁的答语“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何以得之。”这些看似清淡平易的文字,显示了作者坚实深厚的汉字文化功底。明治维新时期的诗人国分青崖还追怀日本汉诗的始祖弘文天皇,其《咏诗》曰:

弘文聪睿焕奎章,东海诗流此滥觞。仰诵皇明光日月,于今艺苑祖君王。

此外,夏目漱石这样的日本近代文豪,虽曾留学西洋,精通英文,其小说创作已近欧美风格,却也写得纯熟的汉诗、汉文。

(四) 国名:从“倭”到“日本”

汉字文化传日,造就其国名。

日本列岛在古代并无国名,中国史书最早给定并记述其国名为“倭”,如《汉书·地理志》说:“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来献见云。”中国人称之为“倭”,与其国人民身材矮小有关。“倭”的日语读音为“邪马台”,与“大和”读音相同。此后一个长时期,中国称日本为“倭”(《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册府元龟》等称“倭”)或“倭国”(《后汉书·东夷传》、《宋书·夷蛮传》等称“倭国”)。日本也自称“倭”,直至10世纪,藤原公任编《倭汉朗咏集》,还以自国为“倭”,中国为“汉”,彼此对称。12世纪,觉明在为《倭汉朗咏集》作注本时具体解释道:“倭者,本朝也,……汉者,唐家也”。

汉字词“日本”,意为“日之本”(太阳升起处)。这一意义最先出现在圣德太子派出的遣隋使小野妹子向隋炀帝呈递的国书中,《隋书·倭国传》载,遣隋使所上国书,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等语。称其国在“日出处”,已接近“日之本”的涵义。这正是日本人对汉字、汉文有深切理解后的产物。《日本书纪》载,以“日本”为国号,初见于大化元年(645),其时的文献有“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旨”。而将“日本”作为一个国名的正式整词使用,并阐明其内蕴,则见于中国史籍,《旧唐书·倭国·日本传》称:

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云倭国,自恶其命不雅,改为日本。

《新唐书·日本传》论及这个东方国家也说:

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

显然,日本人是接受汉字文化的启迪,从“日出处”、“日之本”的意蕴中创制国名“日本”的。日本学界多持此说^[3](第88-90页)。

(五) “天皇”与汉字文化

日本的核心概念——“天皇”,也采自汉字文化。

“天皇”是中国古典词,其意有三,一为古帝名,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天皇、地皇、泰皇)之一。《史记补·三皇本纪》说:“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这里的“天皇”意谓“统治上天的皇帝”,曾为梁武帝、隋文帝所祭拜^[4](卷六,卷六十九);二为星名,《晋书·天文志》:“钩陈宫中一星,曰天皇大帝。”三为道教中的天帝,道教文献说,元始天尊出现于天地混沌之际,天皇生地皇,地皇生人皇。随着道教和道教文献传入日本,“天皇”这一汉字词成为日本神道教的核心概念,“天皇即神”构成神道教的中坚思想。

日本曾以“大王”称本国国君,如熊本县江田山的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文,有“治天下复○○齿大王”字样,经考证,此为后来史书附会的“反正天皇”当时的真实称号。在古坟时代,“大王”有时又作“大

君”,而“君”是日本古氏族的姓氏之一,大“君”即君姓氏族中的强者。日本以“大王”、“大君”称国君,一直延续到7世纪。据日本史学家东野治之、宫崎市定等考证,7世纪末颁布的《飞鸟净御原令》首次明确规定以“天皇”为本国国君之号。这很可能受到中国以天神比拟人间帝王的影响。中国早在东汉撰写的《越绝书》卷十中已指越王勾践为“天皇”,但此说知者不多。而在道教盛行的李唐,唐高宗和武则天并称“天皇”、“天后”,影响颇大,新、旧唐书的《高宗纪》对此有记述。《旧唐书》卷五称:“上元元年,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唐高宗683年死后,“天皇”是其谥号的一部分(谥曰“天皇大帝”),唐玄宗天宝十三年,改高宗谥号为“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仍有“天皇”字样^[5](本纪五,高宗下)。而7世纪正是日本仿唐的高峰期,遣唐使不绝于途,当然会将中原帝王称“天皇”的信息带回日本,如701年,日本第七次遣唐使粟田真人曾询问中国地方官:“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答曰: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续日本书纪,卷三)这是中国帝王称“天皇”的消息传入日本的较早证据。唐帝称天皇,对崇拜唐文化的日本上层社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日本何时改王、大王为“天皇”,史书记述模糊。《日本书纪》编造“天孙降临”、“神武肇国”神话,列“神武天皇”为第一代天皇,将从神武开始的一系列传说人物以“天皇”名之,又把历代大王改称“天皇”,将这两类所谓的“天皇”排列出一个完整的世系,置于信史中的天皇之前,这显然是后世的附会,日本史学界早已指出其不可当真。关于日本以“天皇”称国君的起始,普遍认同的说法是《日本书纪》所载:推古十二年(608)圣德太子派出的遣隋使小野妹子向隋炀帝呈交国书,有“东天皇敬呈西皇帝”等语。此被视作日本使用“天皇”称本国国君的确证,日本及中国史书多持此说。其实,考察这一国书的书式及用语即可发现,与王羲之、王献之尺牍颇相近似,而二王虽为东晋人士,然其书法被皇室视为国宝,秘不示人,二王尺牍直到唐中叶方拓印面世,8世纪初由粟田真人等携回日本,《日本书纪》恰在此后不久的天平年间(729—749)完成,“东天皇敬呈西皇帝”的书式和以“天皇”称国君的用词,很可能是《日本书纪》修纂者仿效刚刚传日不久的二王尺牍,并参考粟田真人带回日本的唐高宗称“天皇”消息的产物。台湾学者徐先尧所著《二王尺牍与日本书纪所载国书之研究》对此有所剖析;新加坡华裔学者王贞平则作了更详尽的论证,其结论是:该国书“非圣德太子所作,而是《日本书纪》编纂者参照二王尺牍之后的伪作几可成定论”^[6](第182—192页)。

总之,日本使用“天皇”一词,是中国道教传日的产物。而唐高宗称“天皇”则对日本以“天皇”作国君之号有直接启示。日本天武天皇笃信道教,认定“天皇即神”,其在位的673—688年间,又正值唐高宗称天皇之际,在这双重影响之下,颁布《飞鸟净御原令》,首次明确规定以“天皇”为国君之号。大化改新时期制定的《改新诏书》称“天皇是天地间的后主,主宰万民。”以唐朝政制为范例,确立天皇制度。以后天皇的地位与作用多有变化,但“天皇”名号一直沿用至今。

不仅“天皇”一词由中国传入,论证天皇神圣性的“三神器”也仿自中国。首先,“神器”一词,典出汉籍《老子》的“天下神器”和《汉书》的“神器有命”;其次,中国的“神器”指代表国家政权的实物,如玉玺、宝鼎之类,《日本书纪》仿此,以八咫镜、草薙剑、八坂琼曲玉为“三宝器”,中世以后称“三神器”。

(六)“年号”与汉字文化

日本以天皇“年号”纪年,其法仿自中国;年号所用文字,也都取自中华元典,这是汉字文化影响日本的又一明显表现。

日本用年号,始于以“大化改新”垂名青史的孝德天皇,他将实行变革的一年定为“大化元年”(645),这是日本的第一个年号。“大化”一词,意谓“伟大的教化”,典出《尚书·大诰》:“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和《汉书·董仲舒传》:“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无一人之狱矣”。孝德天皇之后的六代天皇制定年号偶有中断,从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年号起,直至今日延续不辍,并且都从中华元典择取两字组成。江户末期孝明天皇的两个著名年号,一为“文久”,典出《后汉书·谢该传》:“文武并用,成长久之计。”二为“庆应”,典出《文选》汉高祖《功臣颂》:“庆云应辉,皇阶受术。”(日本近代启蒙学者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即今“庆应大学”,因始于庆应年间而得名)

日本的年号,均由公卿、重臣、学者从中华元典选取文词,呈天皇(天皇幼,则由摄政)确定。这种方法在日本成为传统定制。据统计,自孝德天皇用“大化”年号以来,天皇年号共 249 个,出自中国典籍 106 部,引用较多的是《尚书》38 次,《周易》27 次,《诗经》15 次。其他如《礼记》、《周礼》、《孝经》、《史记》等也多次被选用。中国自汉代至宋元,往往是一帝多年号,日本也长期仿效。中国自明代起改为“一世一元”,年号成为帝王的代称,如朱元璋年号洪武,称洪武皇帝;玄烨年号康熙,称康熙皇帝。日本至近代方实行“一世一元”制,年号也成为天皇代称,其年号的文词仍出自中华元典,如:

“明治”典出《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孔子家语》:“长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大正”典出《周易》:“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周易·大畜卦·彖传》:“能止健,大正也。”“昭和”典出《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典出《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史记·五帝本纪》“内平外成。”

(七) 皇室用词与汉字文化

日本天皇仿中国帝王,死后追加谥号,谥号取庄严、神圣义的两个汉字,如神武、绥靖、安宁、懿德、孝昭、孝安、崇神、垂仁、景行、应神等。日本天皇有谥号,是 44 代元正天皇开始的。此前 43 代天皇的谥号,是 8 世纪以后淡海三船奉敕编制的。

天皇的名字,多择自儒家经典,从清和天皇起名“唯仁”以来,70 代天皇有 49 代天皇名中有“仁”字,如孝明天皇名“统仁”,明治天皇名“睦仁”,大正天皇名“嘉仁”,昭和天皇名“裕仁”,现在在位的平成天皇名“明仁”,皇太子名“德仁”。

今天的日本已沐浴欧风美雨百余年,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但围绕天皇及皇室的一系列专门用语,至今严格沿用相关的中国古典词,如玺(御玺、国玺)、御名、巡幸、行幸、还幸、亲临、台临、天览、台览、玉音、玉座、玉体、圣体、玉颜、天颜、龙颜、圣寿、睿虑、圣旨、懿旨、御制、敕语、敕题、敕裁、敕许、敕命、崩御、薨去、奏上、奉答等等。今天从日本报刊见到关于天皇及皇室活动的报道,还充满这类汉字词。日本学者谈及这种文化现象道:

日本的天皇氏族借用中国皇帝制度中的中华思想、礼和皇帝专用词,建立起日本的天皇制^[7](第 262 页)。

(八) “上位语”多源于中国

日本的语言学家指出,构成日语词汇的和语词与汉语词,前者多虚词,后者多实词;前者多生活用语,后者多学术用语。而且,近代以来,汉语词在“上位语”(即雅文化层面用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语言学家飞田良文在所撰《明治以后的语汇的变迁》中统计,明治、大正、昭和的新闻使用度高的 100 个“上位语”的语种分布为(以%表示):

	和语	汉语	外来语	混种语
明治	79	20		1
大正	53	39		8
昭和	43	54	1	2

这是因为日本长期深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熏陶,其精神文化层面的核心概念多典出汉籍,这种影响力十分深远,“雅语”(上位语)里汉字词占优势的格局并未随着“西化”日深而消解。以下略举数例。

日本神道教用语,多典出汉籍,如“八紘一字”中的“八紘”,语源《淮南子·原道训》:“八紘九野之形埒。”高诱注:“八紘,天之八维也。”指全世界。《日本书纪·神武纪》据《淮南子》“八紘”义发挥道:“兼六合以开部,掩八紘而为宇。”

日本三大名园——金泽的“兼六园”、冈山的“后乐园”、水户的“偕乐园”,皆得名于中国古典:“兼六园”源于宋代《洛阳名园记》“兼六胜”一语,“后乐园”因宋人范仲淹《岳阳楼记》“后天下之乐而乐”得名,“偕乐园”取义《孟子》“与民同乐”、“与民偕乐而不独乐”之说。

今之日本中央政府的部门称“省”(文部省、通产省等等),沿袭中国唐代三省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之称。

日本幕末、明治间最时髦的词句“文明开化”^②,而“文明”典出《尚书·舜典》“睿哲文明”,“开化”典出顾恺之《定命论》“夫建极开化,树声殆则。”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现代日本语汇由汉字词、和语词、外来词(指汉字词以外的来自国外的词语)、混种语4部分组成,汉字词约占一半。据日本语言学家宫岛达夫对昭和31年(1956)出版的《例解国语辞典》所作的统计,其中和语词占36.6%,汉语词占53.6%。另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1962年统计,昭和31年发行的90种杂志中的词汇,和语占36.7%,汉语占47.5%,外来语占9.8%,混种语占6%^[8](第106页,第1014页)。当代日语中外来语(用假名拼写)比例上升,但汉字词在“上位语”、“文化词”中仍据举足轻重地位。

注 释:

① 金田一春彦、林大、柴田武编《日本语百科大事典》缩刷版,大修馆书店1995年5月版,第325—326页。

② 福泽谕吉1867年编《西洋事情·外编》首用此语。

[参 考 文 献]

- [1] 内藤湖南. 日本文化史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2] 冈田正之. 日本汉文学史[M]. 吉川弘文馆,1954.
- [3] 尾崎雄二郎. 中国文字在日本[A]. 蔡毅,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C].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4] 魏 徵.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5] 张昭远,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6] 王贞平. 汉唐中日关系论[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 [7] 山中顺雅. 法律家眼中的日本古代一千五百年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8] 日本语百科大事典:缩刷版[Z]. 东京:大修书店,1995.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Chinese Characters: Far-wide Influence to Japan

FENG Tian-yu

(Research Cent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FENG Tian-yu (1942-), male, Professor & doctoral supervisor, Research Cent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joring in China's cultural history & history of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bstract: Japan, as a member of the cultural world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s been far-wide influenced by Chinese characters. Since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brought to Japa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ords have been widely used there. The name of its country, Mikado and titles, etc. are all from the cul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cul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Japan; Mikado; title